

[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 陈宝良

主持人语:崇祯十七年(1644),中国历史上演了“天崩地裂”的一幕。先是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随后满人率兵入关,明朝宣告覆亡。经历这触目惊心一幕的知识群体,事后无不在深刻反思,大明帝国究竟为何灭亡?

当时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其阐述可谓众说纷纭。若细究之,更多的还是将其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科举八股之习而导致士人学问空疏,缺乏实用的真才实学;二是门户与党争这一传统的官场病,致使读书人以及为官者为了小团体甚或一己的私利,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而置国事于不顾。诸如此类的反思,尽管尚不能道尽明亡的真正原因,然而其中所蕴涵的积极性却不容忽视。换言之,这是问题探讨的起始,进而影响到三百多年来学者对明朝灭亡的具体研究。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理论的引入,乃至研究视野的进一步开拓,今人关于明朝覆亡、以清代明这一朝代更替的研究,已是新见迭出,分析更

为透彻。举例来说,通过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两者关系的探讨,系统阐述明亡清兴的历史演变过程;地理或者说自然环境的变迁,对明清易代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即使对政治领域的关注,也从新的国家控制理论的角度,对其相关的研究领域作了诸多理论上的翻新。本期所收两篇论文,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一则阐述明末东北自然灾害与女真族崛起之间的关系,指出明末东北自然灾害的频繁,既成为建州女真崛起的契机,更是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因素之一;一则论证明代言官与阁臣之间的关系,从两者关系的演变,揭示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历程。就前者而言,东北女真族的崛起,显然已经决定了明朝覆亡的历史命运;就后者而言,政治的逐渐浊化,或者说言官与阁臣之间形同水火之势,对于明亡之责,确实难辞其咎。所有这些,无不都是较为有益的探索。至于其结论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则有待于读者或其他研究者进一步论定。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蔡明伦

(湖北师范学院 历史系,湖北 黄石 435002)

摘要: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强,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关键词:明代;言官群体;阁臣;皇权;权力制衡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4-0042-06

在明代中央权力网络中,言官和阁臣是两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学术界对明代监控

体制和内阁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①,但对言官与阁臣两个官僚群体的互动,却缺乏整体史的研究。本文拟

^① 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张薇:《明代监控体制——监察与谏议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治安:《明代监察制度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王其渠:《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

收稿日期:2007-12-20

作者简介:蔡明伦(1971-),男,湖北仙桃人,历史学博士,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明清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青年基金项目“明代言官群体研究”(07JC770007),项目负责人:蔡明伦。

以言官为主导,就二者在整个明代的关系作一梳理,从动态方面说明言官在权力制衡中的作用,并揭示明代政治的若干特色,敬请方家教正。

在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和发展的早期,在机构设置上,主管行政的丞相和主管监察的御史大夫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想的关系,即二者之间相反相成,相持而长,其要旨在于保证御史大夫监察制衡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丞相的作用。明代在官制设置上也有类似意图,明初“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1]卷239,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己丑},在分权原则下,让各机构互相牵制,彼此制约。不过,虽然言官的监控制衡作用依然被突出,但和秦汉相比,明代中央机构的最主要特点是没有丞相。因此,欲阐明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需先对阁臣法律上的地位和事实上的职权加以说明。

在法律上,明代内阁本职,不出翰林侍从之业,其所掌仅为票拟旨意,备侍从顾问而已,与宋代以前宰相有独立地位,可以决定国家大政之权,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内阁的权势逐渐发展,从初备顾问、视制草,到代皇帝票拟旨意、参与庶政,再到裁决机宜,终至无宰相之名而行相权之实,压制六卿,为机枢政本之地。由于阁臣没有法定权力可以总揽朝政,而欲在实际运作中做到政由阁出,必须和言官打交道。“有明一代,足以影响朝廷行事,而令执政最为棘手者,一为阉寺,一为科道。……科道为君主外廷耳目,掌握言路,阁臣如经常遭其抨击论劾,亦难以展布。”^{[2]269}随着阁臣权势的涨落演变,围绕权力和利益,言官群体与阁臣的关系,在明代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

仁、宣时期,言官与阁臣之间关系和谐,均能立公为国。阁臣杨荣、杨士奇等深受皇帝信任器重,感恩图报,在处理与言官的关系时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这一时期言官素质也较高,颇为阁臣所重。都御史顾佐深受宣宗信赖器重,阁臣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杨士奇、杨荣不仅大力推荐顾佐,而且当顾佐因忠于职守遭人报复时,亦为之主持公道^{[3]卷158,顾佐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言官尽职时难免触犯阁臣,而阁臣并不因此打击报复,相反加以推荐提拔。如宣德中,御史鲁穆持宪甚严,不避强御。杨荣有一家人犯罪,鲁穆置之于法,略不少贷。杨荣得知,并不怪罪,反而以鲁穆贤能推荐其为金都御史^{[4]卷7,史三}。言官与阁臣持正为公,为国去私,不因私人恩怨打击报复,这种情况在明中后期很罕见。不仅如此,明前期的言官一般能保持独立性,对阁臣不卑不亢。如宣德时薛瑄为御史,为人正派,“每至三杨门,止投刺而去,三杨慕其为人,恨不得一见。后访于朝班中

谁为薛御史,始识其面”^{[5]卷7,企美}。言官与阁臣之间这种和谐为公、注重气节品质的风气,对保证明前期政治清明有重要作用。

正统至正德时期,宦官势力膨胀,明代四个为祸甚烈的宦官,有三个出现在这一时期。面对宦官的肆虐,同为士大夫阶层的阁臣与言官往往联合起来,对宦官势力予以压制。如成化时汪直弄权,领西厂为非作歹,阁臣商辂等合疏奏汪直罪恶,言官也连疏弹劾,迫使宪宗暂罢西厂^{[3]卷176,商辂传}。正德时,刘瑾为祸,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联合陶谐、胡煜等言官,交章论谏,要求武宗裁革宦官,清除刘瑾,持之甚坚^{[6]卷33,中官考下}。

不过,正统以后,由于明朝政治走向腐败,皇帝、阁臣和言官素质较明前期都有所下降,因而阁臣与言官之间为了私利,彼此趋附、讨好勾结的情形增多了。如成化年间,“万岁阁老”万安颇事请托,一进士投其所好,自誉善医,为之治疗阳痿病,因得为御史,时人语之曰“洗鸟御史”^{[7]卷5.61}。弘治新政时,阁臣调整,刘吉独不动,倚任尤专。“虑科道言之,乃倾身阿结,昏夜款门,靳免弹劾,建言欲超迁科道,待以不次之位”,以柔媚污鄙之态讨好言官,“自是人无复有言之者矣”^{[4]卷9,史五}。不过其得以笼络结纳者,多为沆瀣一气、干进求禄之徒,那些持正不附的言官,则对之交章弹劾,“时言官论荐大臣,必以王恕为首,及论劾大臣,必连及刘吉”^{[8]卷22.18}。刘吉见言官不受笼络,就改变策略,加以钳制倾陷,“数兴大狱,……逐南御史姜绍等,台署为空。中外侧目,言者亦少衰”。刘吉以软硬兼施手段对付言官,久居内阁,成为极其耐弹的“刘棉花”^{[3]卷168,刘吉传}。

嘉靖朝是言官与阁臣关系演进中的重要阶段,二者有合作,如嘉靖初杨廷和及嘉靖末徐阶与言官的合作,但更多的是对抗,主要是言官与礼仪新贵张璁、桂萼的对抗,特别是与权相严嵩的对抗。因此,从总体上而言,嘉靖朝言官与阁臣处于关系紧张、对抗的状态。

武宗死后,饱受打击的言官,势力逐渐复苏,为避免重蹈覆辙,对武宗朝弊政的革除和对皇权滥用的制约,成为嘉靖初言官的目标,为此经常群体行动。这个目标与阁臣杨廷和是一致的,因而言官与阁臣在许多朝政处理上态度一致,彼此合作。特别是在“大礼议”之争中,言官群体与杨廷和站在同一阵营,对抗世宗。但世宗效法武宗大施淫威的做法,迫使杨廷和去位,廷杖言官,以强权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

为保证议礼成果,世宗先后将张璁、桂萼等议礼功臣引入内阁,并扩大阁臣事权。礼仪新贵对反对派极尽排挤之能事,言官首当其冲。言官群体没有妥协,屡屡上疏弹劾,言辞极为激烈。张璁、桂萼采取各种手段予以回击:一是激帝怒以击之,利用世宗疑心甚重、对议礼敏感的心理来打击异己。二是兴大狱。嘉靖六年,因李福达之狱,言官遭滴戍

边卫、革职闲住者四十余人。此狱乃郭勋反噬，联合张、桂，以议礼犯众怒为言，尽逐诸臣。三是以考察及令科道互纠等手段整肃、惩治言官。嘉靖时期，言官特别是巡按御史中许多不良习气逐渐暴露，如举劾不实、贪污受贿等，整饬言路和更新宪纲是必要的，张、桂此举有其合理性和积极作用^[9]^[117]。但在动机上，张璠等脱不了公报私仇的嫌疑，“桂萼疾台谏排己，考察京官既竣，令科道互纠劾”^[3]^{卷206}，卢琼传，借此打击异己，钳制言路。

嘉靖朝言官与阁臣之间的冲突对抗，最为激烈和持久的，当属言官与严嵩的较量。言官对严嵩的弹劾，在其进入内阁之前就已开始。随着严嵩为首辅后更加恣意妄为，言官对严嵩父子的弹劾也激烈起来。综观言官对严嵩父子的弹劾，主要集中在严氏父子窃取大权、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败坏纪纲等方面^[10]。面对言官前赴后继的弹劾，严嵩予以反噬。严嵩打击报复言官的主要手段，是激怒帝打击异己，“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媿，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3]^{卷308}，奸臣·严嵩传。此外，严嵩还以察典等方式打击、约束异己言官，“不惟罢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罚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致善类为之一空”^[11]^{卷293}，杨继盛：早诛奸险巧佞贼臣疏，从而建立一道抵挡言官弹劾的防护墙，钳制言路，达到长期劾而不倒的目的。

在嘉靖朝言官与阁臣的互动中，除了对抗外，还有阁臣对言官的笼络及言官对阁臣的趋附。张璠、桂萼虽有世宗撑腰，但在舆论上很孤立，因而极力拉拢、庇护言官中能附己者。给事中陈洸劣迹斑斑，因上疏附和张、桂，“璠、萼遂引以击异己”^[12]^{卷52}，世宗嘉靖五年五月丙午。金都御史李如圭、御史戴金等“承望风旨，论劾大臣”，“此皆萼之死党，相与比周为奸者”^[13]^{卷5}，劾张桂诸臣疏。严嵩对言官也极力笼络，利用把持考选的机会，以利禄馈赠结欢有意附己者^[11]^{卷293}，杨继盛：早诛奸险巧佞贼臣疏，拉拢一批言官为已张目。左副都御史鄢懋卿深附严嵩，为虎作伥，数作过恶^[3]^{卷308}，奸臣·鄢懋卿传。言官依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嘉靖末年逐步凸显，“世宗之季，门户渐开。居言路者，各有所主”^[3]^{卷215}，“赞”。至隆庆朝，这种情况严重起来。

隆庆至万历初，阁臣之间明争暗斗，言官往往以阁臣为进退，充当鹰犬。隆庆元年正月京察，刑科给事中欧阳一敬诋高拱，御史齐康则劾徐阶。“时康主拱，一敬主阶，互指为党。”^[3]^{卷215}，欧阳一敬传。徐阶致仕后，阁臣为赵贞吉、张居正、陈以勤、殷士儋等。高拱再次入阁，又与诸阁臣相倾轧，“其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并居言路，日夜走其门，专务搏击”^[3]^{卷215}，汪文辉传。言官与阁臣的勾结，加速了言官群体的分化蜕变，对万历后期门户党争的局面产生直接影响。

高拱被逐后，张居正任首辅，“赫然为真宰相”^[3]^{卷72}，职官志一，控制言路，言官稍有不合则痛折之。张居

正为一代名臣，明晓事理，对言官的打击遏制虽有私心，但与严嵩等为专宠固位打击言官不同。张居正的意图，除了整肃言官中的不良习气外，“其用心，则在去言官之掣肘，而得行其是”^[2]^[274]。为此张居正行考成法控制言官，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不仅收到了综核名实、振衰起弊的作用，也扩大了内阁的实权，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张居正大权在握，又深受神宗和两宫皇太后信任，“科道皆望风而靡”^[14]^{卷35}，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趋媚之徒比比皆是，“有相率赞颂已耳，有相率保留已耳，有相率祈祷已耳”^[15]^{卷1}，恭陈当今第一切务以回人心疏。不过，言官对张居正的不满始终存在。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祖制，且六科行使监察权，具有独立性，不隶属于任何衙门，直接对皇帝负责。张居正创考成法则不符合此祖制，这就为言官与张居正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御史刘台抓住此要害，弹劾张居正违背祖宗之法，并劾其“偃然以相自处”，擅作威福^[3]^{卷229}，刘台传。张居正大愤，上疏辞政。尽管神宗慰留再三，并将刘台逮下诏狱，廷杖远戍，但“威权震主”的张居正已令逐渐长大的神宗“内顾不堪”^[11]^{卷461}，叶向高：答刘云峤。这种不堪情绪在张居正死后很快释放出来，而配合神宗完成对张居正清算的，是同样遭压制的言官。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率先劾张居正欺君、僭奢等十四大罪状^[16]^{卷131}，万历十年十二月戊戌，其后言官又上疏责张居正生前专断、侵占故辽邸田土等罪。张居正被夺去赠官、谥号，并被籍家，生前尊宠之极的张居正身后一败涂地。言官“交章弹射故相”^[17]^{卷4}，废辽王，动机多不纯，或者争意气，泄私愤；或者迎合神宗，投机取巧，邀功请赏，所劾多诬词。

张居正死后，为了避免再出现类似强臣，神宗有意识地挑选一些“软熟”之人充当阁臣，如申时行、方从哲等，“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弭谐无闻，循默避事”^[3]^{卷218}，“赞”。阁臣素质的下降使内阁权力不断衰落。而言官势力在张居正死后迅速反弹、高涨，“初，言路为居正所抑，至是争砺锋锐，搏击当路”^[12]^{卷68}，神宗万历十二年，以至“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瞽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3]^{卷219}，“赞”。势力膨胀的言官以门户相结，逐渐形成宣、昆、齐、楚、浙等党，攻击时政，于是“阁臣与言路日相水火矣”^[3]^{卷218}，申时行传。

在万历中后期言官与阁臣的较量中，由于言路横恣，“当事大臣莫敢撻其锋”^[3]^{卷236}，夏嘉遇传，而言官在争斗中处于上风，几乎没有一个阁臣能逃过言官的攻击，其中大部分首辅最终被言官赶下或逼下台去。特别是辅臣李廷机，更被言官攻击得体无完肤，“辅臣以齟齬受辱，屏弃积年而后去，前此未有也”^[3]^{卷217}，李廷机传。面对言官的弹劾，阁臣伺机反攻。给事中邹元标劾罢申时行姻亲徐学谟，申时行假他疏逐之去^[3]^{卷218}，申时行传；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蔽蔽，申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以致“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

外”^[18]卷31, 汤显祖: 论辅臣植私党阻言路疏。至于利用京察罢黜有私怨的言官, 以“朋党”之说借神宗打击异己, 也是阁臣惯用的套路。户科都给事中杨恂就弹劾首辅赵志皋“迩来进朋党之说以激圣怒, 陛下纳其谮而恶之。于是假托天威, 肆行胸臆。非显斥于建白之时, 则阴中于迁除之日”^[3]卷230, 杨恂传。为增强对抗力量, 阁臣也注意分化言官, 笼络附己者, 如给事中胡汝宁“权门鹰犬, 以其私人, 猥见任用”^[18]卷31, 汤显祖: 论辅臣植私党阻言路疏等。而阁臣的反攻举动给了言官更多攻击的口实, 结果“言事者益裁量执政, 执政日与枝拄, 水火薄射, 讫于明亡云”^[3]卷229, 赵用贤传。

不过, 万历中后期, 言官与阁臣之间的关系并非全是党争、对抗, 也有正常、良性的一面, 这主要表现在阁臣对正直言官的调护方面。神宗亲政后, “颇恶人论时事, 言事者间谪官”^[3]卷218, 申时行传。特别是神宗因好货、怠政等君德缺失, 遭言官批评, 言官因此多获谴, 阁臣往往从中调剂匡救。“自一贯以及申时行、王锡爵辈, 皆以调护为名, 未尝不婉转力请于上。”^[19]卷24, 门户大略如万历十六年, 吏科给事中李沂因弹劾东厂太监张鲸, 触怒神宗, 下镇抚司拷讯。申时行申救之, 希望神宗网开一面^[16]卷206, 万历十六年十一月庚辰。神宗不听, 杖李沂。王锡爵认为廷杖非正刑, 断不可加之言官, 为李沂抱屈^[3]卷234, 李沂传。阁臣出于公道论救言官的情形在万历中后期虽不多见, 但折射了朝臣面对朝廷危局时所表现出的良知。只是由于万历中后期言官蜕变加剧, 沦入党争漩涡, 而阁臣多软弱无能, 故造成两者间日相水火的局面。

天启时, 政权由魏忠贤窃取把持, 内阁辅政功能丧失殆尽; 言官群体中少数耿直派在与宦官集团的对抗中惨遭打击后, 大部分言官趋附宦官, 成为阉党。以宦官为中心而展开互动, 是天启朝言官与阁臣关系的主要特征。阁臣对言官既有匡救, 也有陷害打击; 言官对阁臣既有攻击弹劾, 也有沆瀣一气同附宦官的。

天启初, “众正盈朝”^[3]卷243, 赵南星传, 魏忠贤尚不敢恣恣, 阁臣对宦官打击言官, 多有匡救。如叶向高救免忤阉人的言官多人^[3]卷240, 叶向高传, 刘一燝对因论客氏而被谪的言官多加疏救^[3]卷240, 刘一燝传等, 言官与阁臣尚能团结。随着魏、客势力日增, 一些言官便将政治筹码压在宦官身上, 纷纷附宦官劾阁臣。如刘一燝“持大体, 不徇言路意, 言路颇怨”, 言官刘重庆、霍维华等交章劾一燝, 刘一燝乞归而去^[3]卷240, 刘一燝传。至于阁臣附宦官击正直言官, 最臭名昭著者莫过于顾秉谦、魏广微。“忠贤得内阁为羽翼, 势益张。秉谦、广微亦曲奉忠贤, 若奴役然。”杨涟等六人被逮, 魏广微实与其谋。“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 皆依媚取容”^[3]卷306, 阉党·顾秉谦、魏广微传, 加上为魏忠贤“五虎”之魁的御史崔呈秀等言官助纣为虐, 天启朝外廷趋附宦官者前所未有。

崇祯朝阁臣更迭频繁, 多为庸碌之辈, 屡遭言官弹劾。为固位行事, 阁臣对言官或调护、拉拢, 或压制、打击。由于门户之见积重难返, 阁臣相互倾轧, 言官参与其中, 彼此之间多以门户和私利为取舍, 绝少在危难时刻的和衷共济。加上崇祯帝的刚愎猜忌, 言官与阁臣之间的水火关系迄于明亡。

崇祯朝阁臣之间互相倾轧, 往往借言官为援手。温体仁与周延儒相轧, 双方各网罗一批言官为之张目。周延儒再相后任用给事中曹良直、廖国遴、杨枝起、曾应遴等为之喉舌。温体仁则用御史史褰、高捷等为腹心, 彼此间互相攻击。充当阁臣鹰犬的言官均非善类, 如“杨枝起险, 廖国遴横”^[20]附识上·崇祯, 185, 更有人格卑劣、反覆无常者, 如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先后趋附杨嗣昌、薛国观、周延儒, 对他们“摇尾生前, 反唇死后”, 其反覆“偶(刘)牢之而过(吕)布矣”^[20]中·崇祯, 63。

为在权力争夺中占得先机, 并掩言官之口以逞私意, 崇祯朝阁臣对言官拉、打结合。周延儒为首辅时, 习惯“揽权壅蔽, 私其乡人”^[19]卷7, 吴执御论周延儒, 因给事中吴麟征与己同门, 故荐其为都给事中, 希望吴能为己所用。但吴麟征持正不阿, 在许多事情上忤周延儒意, “自此与延儒隙矣”^[20]中·崇祯, 57。对不肯附己、与己作对的言官, 阁臣想方设法予以打击。给事中傅朝佑弹劾周延儒险谄, 周延儒激帝怒, “廷杖六十, 创重而卒”^[3]卷258, 傅朝佑传。给事中袁恺劾辅臣薛国观奸佞, “国观闻而衔之, 每袁恺具一疏, 不曰殊属沽名, 则曰何得市恩。若上一改票, 便加降调耳”^[20]上·崇祯, 24。至于温体仁, “愈侧目诸不附己者”, “欲排陷, 故为宽假, 中上所忌, 激使自怒。帝往往为之移”^[3]卷308, 奸臣·温体仁传, “一时阁臣以私怨处人若此”^[20]上·崇祯, 34。阁臣为私利而缺乏休容之度, 睚眦必报; 言官为门户而充当鹰犬, 彼此间意气相争, 罔顾国事。作为明代中央权力网络中的两大中坚力量, 阁臣和言官堕落、腐败至此, 明朝的灭亡已不可避免。

二

综上所述,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衷共济——颀颀抗争——势同水火——阿附党争——与明偕亡的演变过程。鸟瞰两个群体的互动, 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 明代言官监控和制衡朝臣的功能在明前期发挥较好, 至嘉靖时达于其良性作用的顶峰。嘉靖以后, 言官所发挥的正面制衡作用日渐衰微, 其淆乱国事、掣肘政府的负面作用则日益突出, 乃至舍公徇私, 搅在小集团的私利之中, 争门户, 闹意气, 葬送了言官群体的生命力和前途。

明前期政治清明, 言官和阁臣素质都不错, 双方均能循规蹈矩, 立公为国, 和衷共济, 使国家机器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正统以后, 言官群体力量有所增强, 而阁臣势力低

落,言官的制衡作用,更多地表现为与宦官的抗争,并多与阁臣联手。嘉靖时期,言官和阁臣势力都有所增长,特别是内阁在世宗的支持下,权势日重,至严嵩为首辅时,其势重更是前所未有。然而,严嵩擅权的结果,却是招权纳贿,败坏士风,残害忠良,明朝统治危机日重。言官以群体的力量,前赴后继,弹劾不断,很艰难地取得了与严嵩抗争的胜利。言官的群体风范和制衡功能得到比较完美的体现,忠正言官的气节也因此彪炳史册。但这场胜利的代价太大,内阁以皇权为后盾,对言官极尽摧抑之能事,导致言官群体不断分化,缄默保身、趋炎附势、党同伐异等不良习气在言官群体中潜滋暗长。尤其在权力角逐中门户之见日渐凸显,这种倾向对嘉靖以后言官与阁臣的关系影响很大。从晚明的历史事实看,嘉靖中后期言官与严嵩的对抗,是明代言官作为一个群体,其整体素质表现偏好的最后一次亮相。言官与严嵩的颀颀抗争,是二者关系演变的转折点。隆庆以后,言官群体分化蜕变加剧,言官的独立性逐步丧失,趋附阁臣,充当权力争夺的鹰犬和先锋,逐步背离了明初健全和完善言官制度的意图。

尤其令朱元璋意想不到的,言官对政府的制衡,至万历以后逐步走向了其反面,这突出表现在言官对张居正改革的掣肘,以及以党派的力量对政府和国事予以干扰、混淆。张居正的权限及其控制言官的举措虽然违背祖制,但对集中力量推行改革措施,挽救明朝危机是大有裨益的。而以刘台为代表的言官,则抓住祖制做文章,对张居正突破常规的做法大加挾伐,虽然遭到打击压制,而心存不满。这种不满在张居正死后,以极大的破坏性表现出来,尽反张居正生前所为,使张居正改革的成果昙花一现。拘泥于祖制的言官的政治理念过于陈腐,不能在舆论上正确引导统治集团朝救国济民的方向去用力。与张居正相比,言官群体缺少宏大的胸怀和政治远见,其僵化的观念和信条,在16世纪后期的时代环境里,既难强化专制统治,也无法挽救明朝危机。相反,由于言官具有保守与忠直的双重性,使得他们试图维护专制统治的意图,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成为王朝革新的障碍^[21]。

如果说刘台等反对张居正改革的言官,在气节和人格等方面尚有值得肯定之处的话,那么,万历中后期,逐步凌驾于政府之上的言官对执政的攻击和牵制,则纯粹是私利、门户之争,其制衡作用更是走向反动,淆乱政事,使明朝政局更难收拾。万历中后期阁臣多乞休求去,除了神宗怠政、国事难为等原因心灰意冷外,受言官弹劾而去,为主要原因。“宰辅大臣为言者所弹击,辄引疾避去”^{[3]卷305,宦官·魏忠贤传},言官对政府的掣肘,使中枢机构陷于瘫痪,言官的制衡作用被搅在门户党争的浑水中,已毫无积极作用可言。

第二,阁臣对言官的态度,除明前期互相尊重、彼此独立之外,在明代大部分时期内,不外乎两种策略,即笼络讨

好与打击分化相结合。而言官对阁臣两手策略的反应则先后不同。

按照明代立法,大官可以统率小官,但小官也足以牵制大官。“阁臣既无法定权力,可以总揽朝政,则其欲政由阁出,必掌握足以左右朝政之力量,或为其所用,或不为所制,而后始得行之无碍。”^{[2]269}为左右言路,明代阁臣大都对言官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弘治朝刘吉、嘉靖朝严嵩、隆庆朝高拱、万历初张居正、崇祯朝周延儒、温体仁等,莫不如此。这说明,言官群体确实是明代中央权力网络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制衡力量,任何人都不能等闲视之。同时,言官针对阁臣的两手策略,所作出的反应前后不同。隆庆以前,言官整体素质尚好,虽有一部分言官因阁臣的拉拢而趋附,但大部分则不为阁臣的不良诱惑所动,而能坚持原则,绳奸纠谬,故遭到打击的情形所在多有。以嘉靖朝为转折点,隆庆以后,言官群体分化蜕变加剧,整体素质下降,言官多以阁臣为进退,甚至在万历中后期党派势力膨胀而压制阁臣。从言官对阁臣所作的反应,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言官逐步分化蜕变的轨迹,以及其制衡作用的日趋衰弱乃至变异的过程。

第三,皇帝在言官与阁臣的关系演化中,起主导作用。明代言官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以及内阁制度的发展演变,最终目的都是为皇权服务。言官的独立性和阁臣权势的扩张,都是有限度的,被控制在皇权的范围之内。言官与阁臣互动过程中,双方势力的涨落及人物命运,最终往往由皇帝定夺,这种情形在嘉靖、万历时期尤为明显。

嘉靖初,以阁臣和言官为主体的朝臣虽然在议礼中遭遇强权而失败,但其数量在朝臣中所占比例很大,这对世宗来说无疑是潜在的威胁。为此,世宗先后将张璠、桂萼、方献夫等引入内阁,并扩大阁臣事权,增强与朝臣的对抗力量,对言官弹劾张、桂及郭勋等礼仪新贵的举动,视为为杨廷和翻案张目,予以严惩。言官受到打击压制,张璠开始跋扈起来。当世宗感觉张璠“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便有意打击其气焰,一方面提拔夏言与之对抗,一方面对张璠等屡加裁抑,使张璠在阁臣位置上三出三进,这样其嚣张气焰大损,俯首听命于世宗。世宗对言官的意见很少听纳,但为控制张璠、桂萼等,也往往借助言官的弹劾,使之“气为之慑,不敢复恣”^{[3]卷196,张璠、桂萼传}。在言官与严嵩关系上,世宗也是根据个人需要而决定二者间的力量消长。为把持皇权,世宗对阁臣或赏或罚,对言官弹劾或听或否,阁臣和言官不过是世宗手中的一张牌而已。

万历时言官与阁臣关系的演变也与神宗息息相关。张居正死后,言路掀起一股倒张浪潮,但若没有神宗的首肯,言官是不敢对此前威信极高的“元辅张先生”反攻倒算的。“对张居正和万历新政的否定,可以达到两个基本的目的:一是彻底洗雪皇帝被挟制的耻辱,二是将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调整到低能的皇帝可以控制的状态”^{[22]363}。除此之外,

还有神宗出于贪财的私欲^{[23]265}。由于神宗对张居正“有意深罪之”，一些言官“知上意已移”，乃极力迎合，不惜以诬词危言来取宠。神宗借用言官的力量完成了对张居正的清算，但他并不希望言官参与朝政，对言官毛举细故、无穷搜索、扩大打击面的做法深表厌恶。随着言路势张，言官与政府相水火，神宗在对待二者的态度上，是安抚阁臣，厌薄言官。但由于万历中后期神宗长期怠政，所选阁臣皆软熟无能之辈，根本无法应付日益深重的危机和矛盾，面对言官集团的攻击，唯有求去。所以，万历中后期言官结党肆虐、阁臣齟齬受辱而去状况的形成，跟神宗的不作为态度及防范心理密切相关。

总之，言官作为司职监控的一个群体，在明代权力制衡体制中发挥了相应作用，包括阁臣在内的百司均受其牵制。阁臣在权力演变过程中，须经常与言官打交道，双方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作为士大夫集团中两个精英群体，言官与阁臣都有修齐治平的愿望和抱负，但从性质上而言，他们不过是皇帝的耳目和股肱，直属于皇权，是皇权强化的工具和产物，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言官与阁臣的聪明才智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良性作用，但随着明王朝日趋沉暮，二者的力量更多的是在内讧中被消磨，在互动中难以目标一致、精诚团结，反而关系渐趋恶化。言官与阁臣关系的演化，是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一种反映。在专制体制下，历史还没有为士大夫提供施展抱负的舞台和机会，故其命运只能是与明偕亡。

参考文献：

[1] 明太祖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2] 张治安. 明代监察制度研究[M]. 台北：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
- [3]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 焦竑. 玉堂丛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 徐学聚. 国朝典汇[M]. 济南：齐鲁书社，1996.
- [7] 陆容. 菽园杂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8] 黄光升. 昭代典则[M]. 济南：齐鲁书社，1996.
- [9] 田澍. 嘉靖革新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10] 蔡明伦. 明代言官与严嵩[J]. 沈阳：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5)：90—95.
- [11] 陈子龙等. 明经世文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2] 夏燮. 明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3] 陆燾. 陆子余集[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4] 赵翼. 廿二史札记[M]. 上海：世界书局，1936.
- [15] 顾宪成. 泾皋藏稿[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6] 明神宗实录[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7]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8] 纪昀等. 御选明臣奏议[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9] 计六奇. 明季北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0] 李清. 三垣笔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1] 侯明. 张居正与言官[J].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6)：36—42.
- [22] 张显清、林金树. 明代政治史(上册)[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23] 孟森. 明史讲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张颖超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upervisors and Cabinet Ministers in the Ming Dynasty

CAI Ming-lun

(Department of History,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2,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supervisors and cabinet ministers came through the process from harmonious to exasperate in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 both supervisors and cabinet ministers had well diathesis and cooperated well for country. It's coming to the turning point in Jiaping period. The supervisors' restricting function worked well when they antagonized to cabinet ministers. However, supervisors curried with cabinet ministers and became pioneer to contend power after Longqing Dynasty. Along with the death of Zhang Juzheng, supervisors were more powerful than cabinet ministers, and they had kept combating till the perdition of Ming. Therefore, supervisors' restricting function made for its invers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s the outcome of emperor power, the evolvment between supervisors and cabinet ministers reflected not only the depravation politics of Ming but also the inevitability of scholar bureaucrats' tragic destiny under autarchy system.

Key words: Ming Dynasty; supervisor group; cabinet ministers; royal power; power restricting